

管仲及其城市营建思想探析

①
42-46

龙彬

TU098-1

(重庆建筑大学建城规学院 400045)

摘要 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思想论述汇集而成一部不朽巨著《管子》。本文从《管子》一书入手,就城市功能、分级、密度、选址、型制、布局和防洪等方面探讨管仲的城市营建思想。通过这一研究,昭示世人;管仲在历史上最早以科学、系统的观点论述了城市营建问题,形成了较先进的城市营建思想体系,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管仲堪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代宗师。

关键词 管仲,城市营建思想,研究,城市发展史,城市建设。

中图法分类号 TU098.1

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早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丰富的历史资料与考古学上的不断发现也一次又一次提供实证,表明我国是世界上城市规划科学技术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最迟在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开国之初(公元前11世纪)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城市规划建设体系。这个体系比古希腊“城市规划之父”希波丹姆(hippodanus)的规划体系早出现约六个世纪。

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技术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占有如此领先地位,这是与古代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在我国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统治者一直把城市规划建设纳入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中,归属“礼制”的范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历代统治集团的一些显要官员(特别是宰辅之类的重臣)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到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并由此对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管仲便是其中杰出的人物。

然而一部漫长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历史却是“见物不见人”的历史。古代众多的规划思想家们随时间的推移而深深地隐没于历史的尘封,这是很可惜的,这种状况也极大地局限了我们对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史的研究。然而这就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大难题。

本文在收集历史素材的基础上,展开对管仲及其城市营建思想的研究,从而在城建史漫长的进程中给管仲及其城市营建思想一个合适的定位。

1 管仲其人其书

管仲(? -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一字敬仲,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初年杰

收稿日期:1997-04-23

龙彬,男,1963年生,博士研究生

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管仲出身贫寒，历经坎坷，但是忍辱负重、忠孝务实、志向远大。所以被齐桓公任为宰相后，他执正四十余年，因势利导，实行改革，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励精图霸，使齐国不断富强，终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主。

管仲的思想学说在春秋战国极为盛行，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派，被列为儒（孔子）、道（老子）、法（管子）墨（墨子）“四大显学”之一。由其思想论述汇集而成的不朽巨著《管子》历来后世所推崇。

太久远的不去追溯，仅就近现代而言，民国时期的治管学者石一参先生在所著《管子今论·概论》中指出，“（管仲）习于权谋术数之说，崇尚功利，政取简易”。并认为“治中国古代之政术者，以管子为能集殷周开国二勋伊尹、吕尚之大成，与老聃之集道学之大成，孔子之集儒学之大成，实堪鼎足，合墨子而为周代之四哲”。石先生在《管子今论·界说》中还指出：“老氏言皇制，孔氏大同之学言帝制，而小康之学言王制，管氏盖纯乎言霸制”。又认为“中国之言古代社会学者，概尊老氏为开宗明义之导师，然关于社会之组织与其政治，独管氏之书特详”。

近人罗根泽《管子探源》中有一段话，认为《管子》“在先秦诸子，衰为巨秩，远非他书所及”，“诸篇亦皆率有孤诣”，“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当代学者滕新才《管子白话今译·导言》亦称：“先秦诸子之精深，无出《管子》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又认为“实则《管子》其书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阴阳、兵、农、儒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本书的丰富内容，而又远非《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属所能仰望项背”。还称，“管仲之所以世所谓贤臣，其利在于亲自操纵国家机器，清醒认识国情，敢冒学理之大不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发展工商，本末兼赅”。而“儒墨道法各家皆拘于学理，未曾实际操戈，逊之管仲远甚矣”！

2 管仲城市营建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都把城市营建纳入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中，视城市营建为立国图霸的根本。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不可或缺部分就是如何搞好城市营建，强国富民。他的城市营建思想散见于《管子》各篇当中。通过耙梳，可归纳为下列几方面：

2.1 关于城市功能问题

我国自古都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说法。这表明城市最初都是以防御为目的建设起来的统治据点，政治与军事是城市的主要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管仲适时地抓住了城市功能新的内涵。他在《治国》中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在《牧民》中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粟”。在《权修》中指出“国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民，民之守在粟”。可见，他认为发展经济是城市功能中不可缺少的新内容，发展经济是立城立国的根本。为了搞好城市经济建设，就要摆正统治者与老百姓的位置关系。为此他在《小匡》中提出了“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以及“士农工商四民，国之石民也”的主张。

上述反映出管仲的城市营建思想强调了城市经济功能,将城市不仅当着政治中心,而且更是一个经济生产中心,所以城市的主体不应是少数统治者,而应是广大从事经济生产的市民。城市功能由“筑城以卫君”转化为“城以盛民”。

2.2 关于城市分级问题

我国古代城市的分级,一度完全是从政治上根据封建礼制和宗法等级原则而定的,例如《周礼·营国制度》就严格地将各类城市划分为王城、诸侯城和都三等。管仲对这种分级概念作了根本否定,他在《乘马》中提出“千室之都,万室之国”的新概念,主张按城市人口的多寡作为分级标准。人口多,城市自必大,故称“国”;人口少,城市则小,故称“都”。按人口来划分城市等级,实际上就是按城市经济繁荣程度来体现“城以盛民”观点的分级方法,更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对礼法至上的古代社会而言,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观念。

我们现在划分城市等级一般就是以人口和经济作为标准的。这也验证了管仲思想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2.3 关于城市密度问题

管仲提出了根据土地等级安排城市,控制城市密度的新主张,重视城市与农村的配合关系。他在《乘马》中出:“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二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这就是说,在土地肥沃的地区,耕地产量高,可以供养较多的城市人口,故城市密度可大。反之,则城市密度宜小。

他还进一步在《八观》中阐述了上面的观点。他指出:“夫国城大而田野浅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他又指出:“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

这些思想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要根据具体的用地条件,科学地确定城市开发强度,处理好“人-城市-环境”三者的有机关系,使之和谐发展。

我国当前城市规划界推崇与追求的可持续发展观可以从此找到思想的滥觞。

2.4 关于城市选址问题

我国古代有非常重视城市选址问题的优良传统,在《诗经》中就有三首很典型的择址诗《公刘》、《绵》和《定之方中》分别记述了公刘居豳、古公居岐和卫文公居楚丘的选址过程、内容和方法。

管仲对城市选址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乘马》中是这么说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他在《度地》中还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这些主张表明管仲在选址时很重视地利,讲求城市建设经济效果,使城市既有险可依,得交通便利,又根植于富足的农业资源的基础上,有可靠的物质保证。管仲的这些思想对后代城市建设的选址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2.5 关于城市型制问题

由于管仲在城址选择上重地利,讲实效,所以他在《乘马》中对城市型制也相应提出了“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见解,强调城市型制应充分结合地利条件,务必视地形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对突出城市个性特色,摒弃单一的城市格局,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古代崇尚自然的传统观念的集中体现。

2.6 关于城市布局问题

管仲从有利于城市功能发挥,便于城市管理角度出发,在《大匡》中提出城市的组织要“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又在《小匡》中进一步阐述了“士农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的按职业作为分区依据的城市布局思想。

关于宫城的布局,管仲认为应居中而处,故在《度地》中指出“天子择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

由此可见管仲关于城市布局的论述,不仅涉及了城、郭的具体安排以及按职业聚居划定分区,实际上还形成了以功能分区作为规划结构的基本组织单元的意见。

2.7 关于城市防洪问题

管仲在《度地》中将城市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归为五种,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并进一步指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因此重点论述了在城市营建当中如何防治水害。

他认为首先应从选址上避免水害,所以在《乘马》中指出城市选址应该“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其次要建设好城市的堤防和沟渠排水系统,他在《小匡》中提到要“渠弥于沟渚”,在《度地》中又说,“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为加固堤防可以“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水决”。为了做好防洪工作,他认为应当加强组织与管理。在《度地》中他指出:“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廓、堤川、沟地、官府、寺舍及洲中”。还要“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又在《问》中建议国君应督促防洪建设,“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而不修者,上必讥之”。最后管仲还对修筑堤防的最佳时机作了选择,他认为“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莫,生可食;寒暑调,日可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

由此可见,从城市选址到堤防、沟渠排水系统建设、管理、监督等方面,管仲都作有详细论述,形成了古代完备的城市防洪学说。

3 结语

通过上各节的探讨、分析、研究,可以看出管仲城市营建思想的系统性,完整性与科学性,也使我们充分的根据确认管仲在历史上最早以系统、科学的观点论述了城市营建问题,形成了较先进的城市营建思想体系。他的城市营建思想较之《周礼·营国制度》来说有显著差异和巨大的进步,突破了《周礼·营国制度》中封建礼法等级至上的桎梏,更加着重于从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诸方面来探索城市营建方法。这种观点更科学也更贴近城市的本质。因此对后世的城市营建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不仅指导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发展方面,是“秦制”的形成基础,为西汉所取法,对前期封建社会规划制度的确立作了显著的贡献;而且在东汉以来的城市营建活动中产生了实质性深刻影响,对中后期封建社

会规划制度的确立作了实质性的贡献。称管仲为城市建设方面的一代宗师并不过誉。

参 考 文 献

- 1 石一参, 管子今注, 中国书店影印, 1988
- 2 滕新才译注, 管子白话今译, 中国书店, 1994
- 3 董鉴泓编,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工出版社, 1989
- 4 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 北京: 中国建工出版社, 1986

Study on Guan Zhong and His Thoughts on City Construction

Long Bin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 400045)

Abstract Guan Zhong was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and thinker in the early ag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is masterpiece, *Guan Zi*, gave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n his thoughts. By engaging in the study of *Guan Zi*,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views on Guan Zhong's thoughts of city construction, which include city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density, selection of site, form, arrangement, flood prevention etc. In the article, it is clearly shown that Guan Zhong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expounded the theory of city construction scientif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in the history, and made a big contribution to the city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a. Guan Zhong was the master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uan Zhong, thoughts on city construction, study

(编辑:袁江)